

# 中非语言类型研究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胡 方

**摘要:**论文一方面从学术史的角度述评非洲语言研究对于语言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需求思考非洲语言研究的现实意义,从而论证中非语言类型研究在新时代中国语言学学科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语言类型学;非洲语言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23)06-0116-12

作者胡方,男,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三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非洲语言学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古代中国视华夏为天下中心,周边都是“化外之地”,谈不上去研究,更遑论去关心遥远的非洲大陆。近代之后,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想封但封闭不住的国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逐渐认识到原来中国不是天下的中心,还有其他的文明也曾自称是世界的中心。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中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外部,但主要是投向比自己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先进文明。从“师夷技以制夷”的本能反应出发,主体上是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长处以改革弊病、壮大自身,历经种种艰辛,谋求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语言学也不例外。中国语言学对外从近代开始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语言学理论,对内研究关心自己的问题:从文字改革到拼音方案,从国语与方言到普通话,从汉语到少数民族语言以及跨境语言,从语言文字本体的研究到言语科技相关的应用,等等。

---

\* 本文为中国非洲研究院中非合作研究课题“中非语言类型研究”(CAI-J2020-08)阶段性成果。

因此,中国语言学很少关心地域遥远的非洲语言问题。

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我国开始加强了对非洲的研究。2018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的重要讲话中提出,重点实施对非合作“八大行动”,并宣布“中国决定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同非方深化文明互鉴”。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被列为“八大行动”中“人文交流行动”首项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中国非洲研究院的主办单位。而之前,非洲研究只是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的一个分支领域。在此前后,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云南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师范类大学,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语言类大学相继成立了非洲研究机构。目前我国的非洲研究,包括非洲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等,大致可以用教育部新近通过的一级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来概括,也就是可以将大部分高校的非洲研究视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一个分支。只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少数高校关心非洲语言,而且,就目前来说,主要包括非洲部分大语种语言的教学以及非洲相关语言的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语言与文化等相关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非洲语言学的语言本体研究。因为学习语言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研究语言更是需要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但是,语言的本体研究具有不可替代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语言是人类天生的纽带,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重要识别标志,人们天然地把操与自己相同语言的人识别为“同类”。语言也是文化与文明的载体,扎实的非洲语言研究将有助于促进非洲历史与文化、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而长期缺乏非洲语言本体研究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则避免不了无法深入非洲问题核心的弊端。新时代对非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还是深入推进中非合作、深化文明互鉴的具体实践,都对非洲语言的本体研究提出了时代性的迫切需求。同时,经过20世纪前二十年活跃的全球化进程,非洲语言研究的人才储备方面比以往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晓萌教授所指出的,除了本土培养的非洲语言研究的博士之外,在欧洲也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留学生将非洲语言研究作为博士研究课题,<sup>①</sup>因此,有理由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相关研究部门、大学等机构能够吸引、培育非洲语言研究相关的

---

<sup>①</sup> S. Kaji, X. Sun, C. Yang & J. Hajek, “African Linguistics in Asia and Australia”, in H. Ekkehard Wolff (ed.), *A History of African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33 – 250.

专门人才，并给他们以足够的支持。

## 一、学术史视角下的非洲语言研究与语言学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思维诞生于 16 至 17 世纪文艺复兴后的西欧，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在几个世纪之内遍布全球。美国历史学家巴萨拉 (Basalla) 在《科学》提出的科学在全球传播的三阶段模型时至今日对我们仍然具有指导意义。<sup>①</sup> 巴萨拉指出，在第一阶段，非科学国家与区域只是为科学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资源，尤其是像中国、印度这样历史悠久的、拥有自己原本的学术传统的文化大国。但是这个阶段在学术史上非常重要。伴随着军事侵略与殖民扩张，西欧人到达世界各地，当地崭新的地理地貌、动植物、文物考古等信息首当其冲地催生了地理科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一批现代科学学科的迅速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环球旅行带来世界各地的动植物多样性的信息，就不会有达尔文改变人类基本信仰的《物种起源》与进化论。

作为现代学科的语言学正是这样诞生的。从学术史上看，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直接催生了作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语言学的第一个学科体系的确立——历史比较语言学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学术界一般视威廉·琼斯 (Sir William Jones) 于 1786 年在亚洲学会 (The Asiatic Society) 发表的演讲《梵文的语言》(The Sanskrit Language) 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亚洲学会成立于大英帝国殖民印度时期的首都加尔各答。通过对梵文的深入研究，琼斯发现希腊文、拉丁文、梵文之间存在着的语音相似性表明这些语言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而不可能是巧合。与同时期的生物学研究相似，作为语言学第一个现代学科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理清表面上纷繁复杂的世界语言之间的发生学上的谱系关系。

如果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源自于殖民者拥有的现代科学精神及其在学术上的兴趣爱好，那么，非洲语言学的研究则是直接源于欧洲的殖民扩张需求。欧洲人最初的兴趣并非是非洲的语言本身，而是希望通过非洲语言的低级来证明非洲人种的低级，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论证操低级语言的非洲人是学不会高级的欧洲语言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议题就是直接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非洲语言的所谓的含米特化的问题。

---

<sup>①</sup> George Basalla, “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 *Science*, vol. 156, 1967.

题。欧洲殖民者将非洲人分为两大类：一种被认为是较高等的含米特人(Hamitic)，他们一般体型较高、肤色较浅；另一种则被认为是纯种的尼格罗人(Nigritic)，他们的体型较矮、肤色较深。这种划分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其实是殖民者通过分裂非洲人来强化统治的手段。而且，这种带着强烈的种族色彩的人种分类，却披着人类学的科学伪装。殖民者甚至煞有介事地通过测量身高、肤色、鼻梁的宽度与高度等一系列体质人类学参数来界定非洲人的等级。非洲语言的研究也被用来作为证据。含米特语言带有“性数格”等高级的特性；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语言则没有这些高级特性。在这种“科学种族主义”的思潮下，俨然成为非洲语言研究领袖的德国新教传教士迈因霍夫(Meinhof)在完成了《含米特语言》(Die Sprachen der Hamiten)<sup>①</sup>之后，从非洲回到德国汉堡，在新成立的殖民研究所(Kolonialinstitut)建立了一个语音实验室<sup>②</sup>。这对非洲语言学这一科学领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正是在实验室里，非洲语言研究从以前的凭借殖民者高高在上的主观印象走向了“客观科学”的道路。原先，那些披着人类学家外衣的种族论者凭借主观印象便断言：非洲人与欧洲人的发音器官是不同的，因此，非洲人发不了欧洲语言中某些高等的语音。但是，通过实验室的研究，迈因霍夫发现与非洲人相比，欧洲人并不拥有更高级的发音器官，相反，非洲人与欧洲人的发音器官的生理结构与功能没有任何区别。从此之后，非洲语言的研究便抛弃了初期的种族视角，转向语言本体研究，学者们着重描写非洲语言的结构与规律，一个现代学科领域逐渐形成。<sup>③</sup>

因此，由于殖民扩张，欧洲诸国早在19世纪便开始研究非洲语言，并且从20世纪初期开始便逐渐形成了科学的领域。不过，由于人类文明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因此，现代学术体系格局的奠定与发展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二战”之后的布局。其中，美国的非洲语言研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欧洲拥有深植非洲的殖民传统不同，“二战”之前的美国基本不存在非洲语言研究。但是，“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sup>①</sup> C. F. M. Meinhof, *Die Sprachen der Hamiten*, Hamburg: L. Friedrichsen, 1912.

<sup>②</sup> Sara Pugach, “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n Language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with an Emphasis on German Contributions”, in Augustine Agwuele and Adams Bodomo,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frican Lingu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15 – 32.

<sup>③</sup> C. F. M. Meinhof, “Der Wert der Phonetik für die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 *Vox*, vol. 28, 1918.

美国迅速崛起成为非洲语言研究的重镇。因此,回顾非洲语言研究在美国从零到强的发展,对今天的中国极具启发意义。美国的非洲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其发展以学术机构为基础,也就是在大学或相关机构设立专门的研究中心,聚集专业人才。以最为典型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为例:1960年,威廉E·韦尔曼斯(William E. Welmers)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非洲语言的教授。<sup>①</sup>韦尔曼斯一开始加入的是近东语言系,接着于1966年转入新创建的语言学系,接着又于1970年创建非洲语言学研究中心(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简称SAL)。韦尔曼斯于1982年从UCLA退休,其间,培养了一大批非洲语言学领域的博士,成为日后美国与国际的非洲语言学研究主力军之一。韦尔曼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师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家泽利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也是乔姆斯基的导师),他完成于1947年的博士论文是关于Fanti语的,发音人是后来成为加纳第一任总统的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sup>②</sup>。除了加州大学、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威斯康辛等一批大学在“二战”之后纷纷成立非洲语言研究机构之外,美国还有两个团体对非洲语言有需求、对非洲语言研究有特别重要的贡献。一个是宗教背景的“暑期语言学会”(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现在的正式名字为简称SIL International)<sup>③</sup>。“暑期语言学会”成立于1934年,初期受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的长期领导。伴随西方文明扩张的基督教特别重视使用当地语言传播教义,“暑期语言学会”的宗旨便是为传播基督信仰提供全球语言能力支持。因此,非洲语言的描写与研究自然被纳入“暑期语言学会”的领域。另一个团体成立于1961年,是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志愿者团体“和平队”(Peace Corps)。事实上,韦尔曼斯等一些专业的非洲语言学家最初都是从参与非洲的传教任务或者志愿者工作开始的。

美国的非洲语言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描写,而是充分融合了语言学理论发展的方向。这也是美国非洲语言研究所独有的特点。如前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的非洲语言研究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过美国,但是,欧洲的非洲语

---

① W. E. Welmers, *African Language Structur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② W. E. Welmers, *A Descriptive Grammar of Fanti*,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nguage Dissertation No. 39,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vol. 22, no. 3, *Supplement*, 1946.

③ <https://www.sil.org/>。

言研究最多只是为世人揭开了非洲语言的神秘面纱,以描写与基于描写的解释为主。而美国的非洲语言研究则直接与语言学理论发展同步,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语言学理论的飞速发展为非洲语言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另一方面,“二战”后迅猛开展的非洲语言研究为美国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基础与事实养料。这也是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是美国的语言学引领了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而不是更具研究传统与学术底蕴的欧洲国家。以语音研究为例,1968年,乔姆斯基与哈利(Halle)出版了奠定现代音系理论基础的经典著作《英语语音格局》(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简称SPE)<sup>①</sup>。在SPE理论中,关于声调的论述相对单薄,全书仅引用了一篇关于声调的文章,便是王士元先生的《声调的音系特征》<sup>②</sup>,其当时刚刚基于汉语的声调材料完成了关于声调的区别特征理论的思考。也就是说,SPE的声调理论框架是基于汉语声调的视角的。但结果是失败的,因为基于汉语的声调理论解释不了非洲的声调语言。随着非洲声调语言调查的深入,新发现的材料革新了语言学界对于声调的理论思考。尤其是1976年,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基于非洲语言的声调理论一统学术界。<sup>③</sup>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60—90年代,美国学界引领的语言学理论的飞速发展在很多方面都是和非洲语言研究的深入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这种关联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形式学派,功能学派也不例外,比如世界公认的当代类型学创立者格林伯格(Greenberg)同时也是公认的非洲语言专家,常年深耕于非洲语言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 二、欧美非洲语言研究一瞥:以荷兰莱顿大学为例<sup>④</sup>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的非洲语言研究的发展势头有所减缓,这与其以语言学理论为驱动的发展特点互为因果。拥有悠久传统的欧洲的非洲语言研究则相对稳定。

<sup>①</sup> N. Chomsky and M. Halle,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sup>②</sup> William S. - Y. Wang,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vol. 33, no. 2, 1967.

<sup>③</sup> J. A. Goldsmith, *Autosegmental Phonology*, Ph. D. dissertation, MIT, 1976.

<sup>④</sup> 本节主要基于现任职于复旦大学现代语言研究院的史濛辉博士于2020年初提供的调研报告。

这里通过调研荷兰莱顿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 (African Studies Centre Leiden, 简称 ASCL)<sup>①</sup>, 窥一斑而知全豹, 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欧美的非洲语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莱顿的非洲研究中心前身为非洲研究所 (Afrika – Instituut), 成立于“二战”之后的 1947 年 8 月 12 日, 最初由莱顿的一个科学文档中心及鹿特丹的一个交易所构成。之后迁至海牙, 更名为尼德兰非洲商业委员会 (Netherlands – African Business Council, 简称 NABC)。如今的 ASCL 于 1958 年 8 月 28 日正式挂牌, 主要致力于一切与非洲相关的研究及记录。ASCL 目前较为关注的议题主要有四个, 分别是政治与安全; 社会、宗教与文化; 经济; 历史。其主要目标是更好地理解非洲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和状态。ASCL 拥有欧洲最大的非洲图书馆, 馆藏图书约 80,000 部, 期刊约 2,000 册。

ASCL 是一个跨系机构, 研究人员主要来自莱顿大学的各个不同的系所。以语言学为例, 其核心研究人员多在莱顿大学语言学中心 (Leiden University Centre for Linguistics, 简称 LUCL) 供职。莱顿大学的非洲语言学的研究主要也是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它汇集了一批非洲学家 (Africanists), 他们共同组建了非洲语言学系 (Vakgroep Afrikaanse Taalkunde)。其中, 非洲语言学的研究专家主要包括扬 · 沃霍夫 (Jan Voorhoeve)、阿奇里 · 埃米尔 · 米森 (Achille émile Meeussen)、约翰 · 斯图尔特 (John Stewart)、汤姆 · 库克 (Tom Cook)、蒂洛 · 沙德伯格 (Thilo Schadeberg)、保罗 · 纽曼 (Paul Newman)、保罗 · 波利多沃尔夫 (Paul Polydor de Wolf)、马丁 · 穆斯 (Maarten Mous)、费利克斯 · 阿梅卡 (Felix Ameka) 等人。

扬 · 沃霍夫 (1923—1983) 的主要贡献在对贝努埃 - 刚果 (Benue – Congo) 语支的研究。他关于分布在喀麦隆的班图语的声调研究, 为今后的同类研究制定了描写框架与标准。<sup>②</sup> 此后, 保罗 · 波利多沃尔夫 (1936—2003) 对于贝努埃 - 刚果语支名词类型的研究也成为该语支比较研究中的经典。<sup>③</sup>

除了贝努埃 - 刚果语支外, 就更广的尼日尔 - 刚果语系而言, 约翰 · 斯图尔特 (1926—2006) 的工作十分耀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音系研究。在元音方面, 其 1967

---

① <https://www.ascleiden.nl/>。

② Jan Voorhoeve, “Tonology of the Bamileke Noun”,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vol. 10, no. 2, 1971.

③ Paul Polydor de Wolf, *The Noun Class System of Proto – Benue – Congo*, The Hague: Mouton, 1971.

年的论文揭示了 ATR 类型的元音和谐及其音系表现。<sup>①</sup>在声调方面,其 1983 年的论文对 downdrift 和 downstep 的区别有精彩的论述。<sup>②</sup>阿奇里 · 埃米尔 · 米森(1912—1978)是莱顿另一位声调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为学界留下了著名的乌米森定律(Meeussen's Rule)。<sup>③</sup>该规则主要指的是在一些班图语的韵律单位中,两个连续高调中的后一个会变成低调。康斯坦斯 · 库奇 · 洛詹加(Constance Kutsch Lojenga)也有许多对于声调方面的研究,其在《劳特利奇非洲语言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frican Linguistics)一书中关于声调的文章是对她该方面研究一个较好的总结。<sup>④</sup>此外,约翰 · 斯图尔特在语言构拟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其以 Akan 和一些 Kwa 语言为基础,严格遵循历史比较法,最终重构了尼日尔 - 刚果语系(Niger - Congo)<sup>⑤</sup>。对尼日尔 - 刚果语系语言的研究传统之后被蒂洛 · 沙德伯格(Thilo Schadeberg)和斯蒂芬 · 埃尔德斯(Stefan Elders, 1965—2007)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体现在他们对 Swahili<sup>⑥</sup>、Umbundu<sup>⑦</sup>、Mundang<sup>⑧</sup>、Kulango<sup>⑨</sup>等语言的一系列研究中。

莱顿非洲语言学还是亚非语系(Afroasiatic)研究的一大重镇。其中马丁 · 穆斯是 Cushitic 和 Omotic 诸语的专家<sup>⑩</sup>,他对 Iraqw<sup>⑪</sup>和混合语 Mbugu/Ma'<sup>⑫</sup>的研究是该领域

<sup>①</sup> John M. Stewart, "Tongue Root Position in Akan Vowel Harmony", *Phonetica*, vol. 16, 1967.

<sup>②</sup> John M. Stewart, "Downstep and Floating Low Tones in Adioukrou" 1,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vol. 5, no. 1, 1983.

<sup>③</sup> Achille Émile Meeussen, "Morphotonology of the Tonga Verb",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 vol. 2, no. 1, 1963.

<sup>④</sup> Constance Kutsch Lojenga, "Tone and Tonology in African Languages", in Augustine Agwuele and Adams Bodomo,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frican Lingu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72 – 92.

<sup>⑤</sup> John M. Stewart, "Niger - Congo, Kwa", in T. A. Sebeok, eds.,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7, *Linguistics in Sub - Saharan Africa*, the Hague: Mouton, 1971, PP. 179 – 212.

<sup>⑥</sup> Thilo Schadeberg, *A Sketch of Swahili Morphology*(2<sup>nd</sup> ed.) ,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4.

<sup>⑦</sup> Thilo Schadeberg, *A Sketch of Umbundu*, Cologne: Rüdiger Köppe, 1990.

<sup>⑧</sup> Stefan Elders, *Grammaire Mundang*, Leiden: CNWS, 2000.

<sup>⑨</sup> Stefan Elders, *Grammaire Kulango (parler de Bouna, Coôte d' Ivoire)*, Cologne: Rüdiger Köppe, 2008.

<sup>⑩</sup> Maarten Mous, "Cushitic", in Zygmunt Frajzyngier & Erin Shay, eds., *The Afroasiatic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42 – 422.

<sup>⑪</sup> Maarten Mous, *A Grammar of Iraqw*, Cologne: Rüdiger Köppe, 1993.

<sup>⑫</sup> Maarten Mous, *The Making of a Mixed Language: The Case of Ma'a/Mbugu*, Amsterdam: Benjamins, 2003.

的必读文献。此外,马丁·科斯曼(Maarten Kossman)是Berber专家<sup>①</sup>。荣休教授哈里·斯特鲁默(Harry Stroomer)对Oromo语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sup>②</sup>。

近期莱顿正在进行的关于非洲语言学的研究项目主要有以下三个:(1)由马丁·穆斯主持的关于东非语言发生学的项目<sup>③</sup>;(2)维多利亚·奈斯特(Victoria Nyst)关于非洲手语的研究<sup>④</sup>;(3)詹内克·范德瓦尔(Jenneke van der Wal)对班图语信息结构的研究<sup>⑤</sup>。

莱顿十分注重博士生的培养工作,这使得莱顿的非洲语言学研究保持了长时间的繁荣。从内容上说,莱顿的非洲语言学方面的博士论文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参考语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Nyst对Adamorobe手语的记录<sup>⑥</sup>;斯蒂尔茨(Stirtz)对Gaahmg的记录<sup>⑦</sup>;斯米茨(Smits)对Lumun的记录<sup>⑧</sup>;约瑟维格(Joswig)对Majang的记录<sup>⑨</sup>。第二类是专题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德·维特(de Wit)对于Liko音系和句法的专题研究<sup>⑩</sup>;查武拉(Chavula)对于Citumbuka动词专题的研究<sup>⑪</sup>;比文-汉姆(Beavon-Ham)对Saxwe声调的描写<sup>⑫</sup>;克波格鲁(Kpoglu)对于Ewe语领属结构的研究<sup>⑬</sup>。

自1970年以来,莱顿每年都会召开关于非洲语言研究的研讨会——非洲语言暨

- 
- ① Maarten Kossman, *Essai sur la Phonologie du Proto-Berbere*, Cologne: Rüdiger Köppe, 1999.
  - ② Harry Stroome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Southern Oromo Dialects in Kenya*, Hamburg: Helmut Buske, 1987.
  - ③ <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vacatures/2019/q3/19-381-phd-position-in-the-nwo-project>.
  - ④ <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research/research-projects/humanities/from-gesture-to-language>.
  - ⑤ <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research/research-projects/humanities/basis>.
  - ⑥ Victoria Nyst,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Adamorobe Sign Language (Ghana)*, Utrecht: LOT, 2007.
  - ⑦ Timothy Stirtz, *A Grammar of Gaahmg, a Nilo-Saharan Language of Sudan*, Utrecht: LOT, 2012.
  - ⑧ Helena Johanna Smits, *A Grammar of Lumun: a Kordofanian Language of Sudan*, Utrecht: LOT, 2017.
  - ⑨ Andreas Joswig, *The Majang Language*, Amsterdam: LOT, 2019.
  - ⑩ Gerrit de Wit, *Liko Phonology and Grammar: a Bantu Language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Utrecht: LOT, 2015.
  - ⑪ Jean Josephine Chavula, *Verbal Derivation and Valency in Citumbuka*, Utrecht: LOT, 2016.
  - ⑫ Virginia Renee Beavon-Ham, *Tone in Saxwe*, Amsterdam: LOT, 2019.
  - ⑬ Promise Dodzi Kpoglu,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in Tongugbe, An Ewe Dialect*, Amsterdam: LOT, 2019.

语言学年会(Annual Colloquium on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简称 CALL),至今已经超过 50 届。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莱顿还承担《非洲语言与语言学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简称 JALL)的编辑工作<sup>①</sup>,现任的两位主编费利克斯·阿梅卡(Felix Ameka)和阿泽布·阿姆哈(Azeb Amha)都任教于莱顿。

### 三、中非语言类型研究的时代意义

综上,非洲语言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是语言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围绕非洲语言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发展的脉络。随着“二战”之后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逐渐形成当今的格局。语言学的诞生与发展并非基于任何实际用途,而是根源于人类觉醒的科学精神与全球视野提供的新的信息资源驱动下的本能好奇心。按照巴萨拉的三阶段模型,科学在全球的传播在经历了非科学国家与地区提供资源信息的第一阶段之后必将迎来具有殖民科学(colonial science)色彩的第二阶段,并最终在第三阶段实现独立科学(independent science)。在巴萨拉的三阶段模型中,科学传播的关键期“殖民科学”并非一定要有实际存在的殖民关系,而是指该国家与地区的科学发展尚处于“依赖性的”(dependent)阶段。巴萨拉讨论的以自然科学为主,但三阶段模型同样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的殖民科学阶段往往更典型,历时更久。巴萨拉的三阶段依次发展,此消彼长,但却也不是一个阶段完全代替另一个阶段,尤其是在中国、印度等本身拥有历史悠久的古典知识传统的国家与地区,三个阶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共存。

中国有“格物致知”的传统。现代意义的科学精神虽发轫于西欧,但其方法乃人类之普遍共有。实践证明,科学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利器。语言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以人类文明与文化的载体——语言为研究对象,因此显得尤其重要。在现代学术史上,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心智主义等语言学学术思想在现实社会中阐释了学术话语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对现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语言学尚处于三阶段共存时期。一部分学者拒绝理论思考,专门致力于提供材料。更多的学者缺乏

<sup>①</sup> <https://www.degruyter.com/view/j/jall>。

科学精神与创新能力,严重依赖于西方的理论,热衷于寻找中国的语言学材料来为西方的理论做注脚,殖民科学意味浓重。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走在了发展独立科学意义的中国语言学的道路上。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非洲语言研究对于我们来说独具意义。欧美的语言学发展史已经证明了拥有全球视野的重要性。深入研究自己的语言对于分支学科来说当然重要,但对于整个学科来说,只关注自己的语言不足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只有科学精神与新材料、新方法的碰撞激发才是学科发展的永恒动力。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关于如何推进非洲语言的研究问题。我们认为,在推进非洲语言的基础研究的同时,要加强非洲语言的应用研究,积极推进相关的拓展工作。非洲语言的本体研究是一项基础人文研究,但它不只是属于书斋里的学问,而是面向非洲土地与田野、面向非洲人民的学问。中国人研究非洲语言有什么现实意义?如何发挥这些专业人才的作用,让他们的专业技能有广阔的用武之地?这是与基础研究工作同样重要的问题。回顾欧美国家研究非洲语言的历史,他们经历了从殖民扩张、文化扩张到逐渐走上科学的研究的历程,而中国的立场与视角显然不同。中国与非洲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二战”之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泥潭中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在经历种种风雨之后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大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正处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道路上。因此,中国的非洲研究是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出发的,而非洲语言的本体研究则是深化中非文明互鉴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中非交流的紧密,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日益增多,同时,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也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非洲裔人口的聚居区,但很少有研究涉及这些非洲人群的语言文化生活。因此,首先当然应该支持开展中国境内非洲人聚居区的非洲语言生活情况调查,建议相关部门关心非洲人群的语言文化生活,在社区工作中配备专业服务人员。这是一项带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常态化的社区管理结合学术性的社会学调查、语言文化方面的关注,在现实层面践行深化中非文明互鉴,对于消弭文化隔阂、创建中非和谐社区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另一方面,在非洲的中国人也日益增多。建议在非洲的孔子学院多配备语言研究专业人员,多吸收懂非洲语言、对非洲语言与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担任教师,鼓励使用当地语言传播汉语文化与中华文明,在深层次的文明互鉴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总之,除了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业性学术

研究之外,中国的非洲语言研究要面向实际应用、面向中非交流,让基础研究与交流应用二者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非洲语言的本体研究工作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非交流,深化文明互鉴;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热爱非洲文化、懂非洲语言的专业人员从事中非交流活动,一定也会促进非洲语言的研究工作。

中国是汉藏语系语言的大本营,也是包括南岛语系、南亚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在内的诸语言的家乡。更加宏观地看,这些语系与语言沿着亚欧大陆向北、向西延伸,便与西亚、非洲的诸语系语言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带一路”上的完整的语言景观。有意思的是,汉藏语系与非洲诸语系的语言距离遥远,完全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但汉藏语系与非洲的语言在类型上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相似性,比如很多语言都有声调。中非语言类型研究的视角有助于学者们打破自身的语言背景与学术背景的局限,从最丰富的语言多样性去追寻人类最普遍的语言规律,而不是眼里只有自己的语言,片面强调汉语的特殊性,或者眼里只有自己熟悉的语言,认为英汉一比较,自己就掌握了全世界的语言规律。

[责任编辑:张莹]

[责任校对:胡晓东]

## Typological Studies on African Langua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Chinese Perspective

HU Fa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ignificance of African language stud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on the one hand, and proposes that typological studies on African languages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hinese linguistics in the new era on the other hand. Moreover, the inquiries into Sino – African linguistic typologies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general.

**Key words:** linguistic typology; African linguistics; construction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cademic history

[本文原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116-127页]